

马紫云, 涂传飞, 张慧杰, 等. 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历史考察[J]. 体育学研究, 2026, 40(2): 133-146.

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历史考察

马紫云¹, 涂传飞¹, 张慧杰², 王道杰³

(1.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2.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3. 南昌大学 体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 关于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 学界长期存在争议。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及逻辑分析法对此进行了重新考察。研究辨析了“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与“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这两种主流观点, 发现其史料确凿性与论证严谨性均可能存在不足, 尚难以完全令人信服。通过对现有原始史料的挖掘与考证, 研究认为: 第一, 追溯最早的篮球宣传报道与最早的篮球实践活动这两条线索有助于厘清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 第二, 中国最早的篮球宣传报道, 应为1895年12月2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所刊载的篮球活动预告; 第三, 中国最早的篮球实践活动, 极有可能是于1896年1月4日下午4点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所的活动室内举行的趣味性篮球游戏, 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分别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来会理和天津青年学生。这两大标志性事件均发生在天津, 进一步夯实了其作为中国篮球“摇篮”的历史叙事基础, 为中国篮球史补充了关键早期史实, 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考证, 研究建议中国篮球协会等相关机构重新评估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相关表述的严谨性。

【关键词】: 篮球报道; 篮球活动; 篮球史; 传入中国时间;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 来会理

【中图分类号】: G8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6)02-0133-14

DOI: 10.15877/j.cnki.nsic.20250821.001

1891年, 篮球运动诞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春田学院(Springfield College)。该学院隶属于当地基督教青年会, 在当时是一所主要培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学校。随着1895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派遣首位西干事来会理(D. Willard Lyon)来华, 并以天津为工作之起点建立基督教青年会^[1], 这项新潮的体育运动也随之被引入中国。青年会及教会学校通过大力推广近代体育项目, 使篮球运动在中国逐渐普及并发展起来^[2]。

然而, 研究团队在深入查阅关于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各类文献和报道后, 发现尽管学界普遍承认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篮球传播中的关键作用, 但关于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地点与形式, 却在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众说纷纭。这些历史叙述上的模糊与分歧不仅直接关乎中国体育史研究的精确性, 也削弱了公众对中国篮球起源的深入认知, 其影响已远超单纯的时间节点之争。因此, 厘清这一历

史问题, 既是对关键史实的考证, 更是对中国体育史中一段重要文化记忆的溯源与重构。立足于对既有研究成果与局限的系统回顾, 通过考辨新近获取的原始史料, 研究尝试对篮球运动早期传入中国的过程展开系统梳理与考证, 力求提供一个更为清晰、准确的历史描述。

1 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学术史回顾

1.1 全球视野: 基督教青年会与篮球运动的跨国传播

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件的国外研究, 需将其置于全球性的历史思想与组织网络中。

收稿日期: 2025-04-10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项目留金选([2023]40号)。

第一作者: 马紫云, 硕士生, 研究方向: 体育历史与文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信作者: 涂传飞,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历史与文化。

19世纪末,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事业植根于“强健派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与“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两大思想运动。前者视体育为塑造健全人格的途径,为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实践提供了驱动力^[3];后者则将其提升为社会改造的工具,倡导应用基督教伦理解决具体社会问题^[4]。在此背景下,美国春田学院体育部主任路德·海尔希·古立克(Luther Halsey Gulick Jr.)指导体育教师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于1891年发明了篮球。其原始13条规则于1892年在春田学院校报《三角》(*The Triangle*)上首次公布,使这项运动正式化^[5]。20世纪初,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的领袖约翰·穆德(John R. Mott)表示要通过体育与教育等手段向全球青年传播基督教文明^[6]。篮球因其规则简单、强调协作,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理念高度契合,被发明后迅速成为其实现组织使命的理想载体,并在全球得到推广与发展。

国外学界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这一具体历史议题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篮球发明者奈史密斯。早在1914年,奈史密斯在《美国体育评论》(*The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发表的“篮球”(Basket Ball)一文中便提及,篮球运动发明后作为“摇篮”的基督教青年会正是第一个接受并系统推广这项运动的组织,不仅在美国社会及高校当中进行传播,更将这项运动传播至加拿大、中国、日本等世界各地^[7]。随后,在其1941年出版的著作《篮球:其起源与发展》(*Basketball: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中,奈史密斯进一步指出中国是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国家之一,在篮球运动起源后的几年内就在中国兴起,并认为是在189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盖利(Robert Gailey)传入^[8]。奈史密斯的这些早期记述,为后来的研究设定了基本框架,但尚属宏观层面的概括性表述,并未有历史考证的依据。

至20世纪中期,华裔学者吴志钢(Chih-Kang Wu)^①在其1956年的博士论文《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the YMCA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中呈现了他在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图书馆发现的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9]。这份原始史料的发现,首次将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研究聚焦到了“1896年1月11日”这一具体日期,为后续学界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史料起点,也是当前研究要论证的核心议题。如埃尔默·约翰逊(Elmer L. Johnson)在著作《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史》(*The History of YMCA Physical Education*)中就沿用了此观点^[10]。随后至20世纪末期,国外学者开始致力于阐释基督教青年会在华推广体育项目的动因。如邢军(Xing Jun)^[11]将基督教青年会在华的体育推广置于美国“社会福音”思潮的延伸中,认为其目标是服务于中国“强国强种”的社会改造工程。此阶段虽有微观考察,但未能激起国外学界的系统考证。

进入21世纪,研究视角则进一步理论性深化,转向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意义价值的文化分析。如朱迪·波伦鲍姆(Judy Polunbaum)描绘了篮球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经历了从“福音工具”到全球化娱乐载体的宏大意义变迁^[12]。而安德鲁·莫里斯(Andrew D. Morris)和约瑟夫·奥尔特(Joseph S. Alter)则借鉴了极具影响力的“挪用理论(appropriation theory)”,认为以篮球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并非被动植入,而是被中国改革者主动选择、改造并融入本土的体育话语体系^[13]。这些深入的文化解读均立足于对基督教青年会推广模式的探讨。当前,关于篮球运动传播到其他国家的研究亦聚焦于此,如斯蒂芬·许布纳(Stefan Hübner)对篮球运动传入菲律宾的案例研究^[14],也证实了基督教青年会推广篮球运动的全球策略具有普遍性与一致性,从而佐证了其在中国的工作是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国外学界研究演进历程为理解篮球传入中国的历史动机与世界背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然而,对于“篮球究竟在哪一天、通过何种具体形式首次被引入中国”这一源头性的微观史实,还相对缺乏基于多重原始档案的系统性考证,这都为后续研究留下了深入探讨的空间。

1.2 本土聚焦: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百年争议

汇集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史料,既有研究成果显

① 国内学界一般将“Chih-Kang Wu”翻译为吴志钢,故研究也采用这一中译名。参见:董尔智.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J].体育文史,1987,(2):66-67.

示“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是中国体育史领域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议题。民国时期,学界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判断相对宏观。学者们普遍将篮球运动的“传入”与基督教青年会在华事业的开展相联系。1932年,“中国篮球之父”董守义在《体育周报》发表的“篮球小史”一文提到:“篮球这种游戏既为青年会所发明的,青年会的设立在中国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所以篮球也就随着青年会传进了中国。”^[15]随后,1936年的《篮球指导》与1948年《篮球研究》两部著作中将时间进一步推测为是在1901年由华北地区的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16-17]。此阶段的论述指出了关键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但因时代的局限性,其立论基础多基于常识的推断,而未有史料实证。

20世纪80年代以后,体育史研究日渐深入,学者们开始对具体的传入人物、地点与年份进行微观考证。如1985年体育学院、系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写组编著的《中国近代体育史》一书中认为美国的蔡乐尔博士于1896—1898年在天津传授了篮球运动^[18]。同年,《旧中国的篮球运动》一文在梳理中国篮球运动发展脉络时,提出传入者为美国的盖利博士(Dr. R.R. Gaily),时间为1898年,地点在天津^[19]。1987年,《中国篮球运动大事记》一书提到:“1894年,美国老普林顿中心的鲍勃·贝利来华传教时,将篮球运动带入我国,最先在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展开”^[20]。尽管各方论述已共同将“天津”和“基督教青年会”视为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关键要素,但其立论基础多依赖于二手文献或零散记录,导致观点莫衷一是。

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料发掘的深入和信息交流的便利化,学者们的观点逐渐聚焦于原始档案史料的考察,且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两种影响深远的主流观点得以确立:一是将首次实践活动视为篮球运动传入标志的“1895年12月8日说”被学术界广泛采纳,如1991年,国家体委组织编写出版的《中国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中国篮球运动史》提到,1895年12月8日,总干事来会理召开筹组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议,演讲前后进行了篮球游戏表演的说法^[21];二是以首次宣传报道及比赛来定义篮球运动传入的“1896年1月11日说”也被众多学者提及,如1995年《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一书写

到:“中国的第1场篮球赛是天津人举行的,报道第1次篮球赛的消息是在1896年1月11日《天津公报》上发表的,这也是第一个报道篮球赛消息的新闻媒介。”^[22]目前,这两种说法因建立在相关原始史料基础之上,而成为学界的主流说法。因此,对于其史料依据与论证逻辑的考察不仅构成了当前研究的对话基础,也是要展开深入辨析的论证核心。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内外学术史的系统梳理,学界对于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既有研究成果富有成效。但国外研究多从全球史和思想史的宏观视角,未能给予一定系统的微观考证。国内的研究历程则反映了史学实践从宏大叙事的建构,转向由原始档案材料的逐步发掘所驱动的微观史学分析的趋势。

然而,其争议之所以一直存在,究其原因:一是部分在于对“篮球运动传入”这一概念的内涵与考察范畴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与侧重;二是既有成果多倾向于引用或参考已有结论,较为缺少基于原始一手史料的系统考证和审辨。有鉴于此,为更清晰地界定探讨对象与范围,研究所考察的“篮球运动传入”,特指篮球作为一项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和运动项目,从其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文字宣传报道,到可考的早期有组织实践活动的整个引入过程。这既包括关注其作为一项体育项目的早期形态的初步引入,而不局限于其是否已达到后世规则完善、竞技成熟的现代体育形态。同时,也意味着对“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考察,将综合且系统地审视相关的早期史料文献记载。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研究致力于厘清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鉴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及其总干事来会理在篮球运动传入中国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与之直接相关的原始史料和文献构成了研究考证的基石。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进行历史考证,重点查阅了大量新近公开的原始史料,包括以下4类史料:一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查阅了1895年12月创刊至1896年2月出版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Tientsin Y.M.C.A. Bulletin*)(以下简称《布告》)原件;二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查阅天津基督教

青年会总干事来会理的工作报告、信函和相关文件等原始资料,内容涉及他在华的工作及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发展;三是在春田学院档案馆查阅了奈史密斯、篮球起源及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的相关档案,并就相关问题访谈了档案馆的管理人员杰弗里·蒙索先生(Jeffrey L. Monseau);四是在天津市档案馆查阅了1895年12月至1896年1月间出版的纸质版《京津泰晤士报》(*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等原始资料。并且还广泛利用Google图书(<https://books.google.com/>)、互联网在线档案馆(<http://archive.org>)和中国知网(CNKI)等线上数字资源平台,以及线下多次前往纽约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基督教青年会、春田学院、天津市图书馆、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波士顿大学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搜集了关于基督教青年会及篮球历史相关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专著等文献资料。此外,还通过线上及线下的方式就选题思路问题访谈了国内多位体育史专家。

2.2 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和互证性

研究遵循了体育跨国史研究所倡导的多源档案互证原则^[23],综合利用了国内外的官方与非政府组织档案,以确保考证结论的严密性。因此,研究团队新获取的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可靠性:首先,《布告》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官方刊物,其内容直接具体地反映了该组织内部的活动安排、项目推广等一手信息,1895年12月创刊至1896年2月间的《布告》对于研究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推广篮球运动的早期情况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史料价值;而《京津泰晤士报》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天津发行量较大、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外文报纸,其对天津社会活动(包括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报道,为研究篮球运动等西方新事物在天津的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外部视角和印证,报道内容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其次,来会理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的工作报告、信函、回忆录是第一手史料,真实反映了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情况。最后,这些档案资料均保存在权威机构,如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春田学院档案馆和天津市档案馆等,且均经过专业化的整理和验证。这些史料之间形成了完整的多重互证证据链,有助于较为清晰地佐证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关键事件和关键时间节点,从而增强了研

究结论的严谨性和说服力。此外,考虑到研究涉及年代久远的早期事件,相关史料往往零散甚至欠缺,研究亦采用逻辑分析法,通过构建多重证据链来探寻历史真相。

3 现有的主要说法及评述

3.1 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

在关于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时间的众多说法中,相对而言影响力最大的说法是“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天津体育史学界的前辈学者兰凤翔老师。兰凤翔在其1990年出版的著作《天津近代体育要事记述》中提到:“(1895年12月)8日,来会理召开第二次基督教演讲会。到会者70多人,有19人当场签名要求入会,(时有预备会员46人)会议前后表演了篮球运动。”^[24]随后,兰凤翔在1991年发表于《体育文史》的论文《篮球运动引入天津考略》中进一步指出:“据当时在津出版发行的《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载:两个星期后,即‘十二月一日(主日)’,由在北洋医学堂任教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安德培博士(Dr. Atterbury)主持召集该校和北洋西学堂两校的基督教徒及懂英语的学生百余人,在‘节制堂’为来会理举行了欢迎会。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2月8日,来会理第二次在北洋医学堂召开基督教演讲会。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的前后均表演了‘筐球游戏’,即来会理引入的篮球运动。”^[25]兰凤翔在这篇论文中明确指出,篮球运动是由来会理在当日引入的。“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不但得到了学界认可^[26-27],也得到了体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采纳。如2015年12月8日,国家体育总局在其官方网站报道了在天津举行的“篮球运动登陆天津120周年主题大会”新闻,其报道中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表述如下:“1895年12月8日,美国人来会理将篮球运动带到中国天津,在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篮球表演赛,这就是中国篮球运动的起源,这一天也让天津成为中国篮球运动‘梦开始的地方’。”^[28]此外,隶属于天津市体育局的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也采用了这一说法:“1895年12月8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北洋医学堂(现和平区大沽北路与赤峰道交口)举行了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大会。在当日的庆祝活动中,

美籍总干事来会理(D. Willard Lyon)组织了‘筐球’(篮球)表演,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篮球运动,也是中国近代篮球运动史上的第一次篮球表演。”^①

然而,“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仍然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该说法的主要支持证据《京津泰晤士报》未提到篮球运动的相关内容。从《篮球运动引入天津考略》一文来看,“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的主要证据是《京津泰晤士报》刊载了相关新闻报道。笔者在天津市档案馆详细查阅了1895年12月至1896年1月间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仅在1895年12月7日刊登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Tientsin*)报道中有如下记载:“会议结束时宣布,将于(1895年)12月8日星期日在医学院附近的互进俱乐部举行另一次会议,以成立协会(At the close it was announced that another meeting would be held Sunday, December 8th, for the purpose of organization, in the room of the Mutual Improvement Club, near the Medical School).”^[29]除此之外,该报道并未提及任何与“篮球”相关的内容。在认真查阅该时期发行的《京津泰晤士报》后,也没有发现任何与“1895年12月8日进行篮球表演”的相关记载。因此,“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的主要证据缺失而难以令人信服。其次,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来会理的相关工作报告亦未提及表演篮球运动的信息。1895年12月16日,来会理在写给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莫尔士先生(Mr. Richard C. Morse)的工作汇报信件(图1)中,详细汇报了1895年12月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大会的情况:“……星期天(1895年12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目的是组织一个协会。对

这一消息的反应超出了所有人的信心。大约有七十名年轻人参加了会议,其中19人签署了入会申请书,46人签署了准会员申请书。莫尔士先生和我本人都签了名。昨天,又有3名中国男孩加入成为正式会员,还有两名外国人加入,他们是安德培博士和一名俄罗斯人。因此,中国会员现在有22名活跃会员和46名准会员……”^[30]如果在当天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大会上确实进行了篮球表演,考虑到体育活动,尤其是篮球运动在基督教青年会中的重要性,这一重要事件理应出现在来会理的详细工作报告中。然而,在其工作报告中并未提及篮球运动表演的相关信息,这使得“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的可信度存疑。

此外,兰凤翱对来会理的简历介绍存在史实上的偏差。兰凤翱提到:“来会理毕业于筐球(篮球)运动的发祥地——美国春田大学,在校期间,来(会理)系筐球(篮球)队员。”^[24]然而,据相关史料考证,来会理既非春田学院的毕业生,亦非奈史密斯的篮球队队员。相关史料表明,来会理先后毕业于美国伍斯特大学(the College of Wooster)和麦考密克神学院(McCormick Theological Seminary),并于1895年作为首任干事被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派往中国组建青年会^[31]。为进一步核实信息,研究团队专门咨询了春田学院档案馆的管理人员蒙索先生。经其仔细查阅学院的课程目录、数字馆藏、校友名册以及年鉴后,并未发现任何与来会理相关的记录,如入学记录、课程成绩或校友信息。基于这些查阅结果,蒙索认为来会理并非春田学院的学生。因此,由于核心证据的缺失与史实描述的偏差,“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的可靠性存疑。

On Sunday afternoon, December 1st, as you will see by the enclosed newspaper clipping, a mass meeting of the students of the city was call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responded, making the largest single meeting of English-speaking young men ever assembled in China for a religious purpose, so far as I am able to ascertain. This was so encouraging that a meeting was called for the suc-

ceeding Sunday (the only day on which they could all be assembled) for the purpose of organizing an Association. The response to this announcement exceeded the faith of all. About seventy young men came out and 19 of them signed the paper for active membership, while 46 signed for associate membership. Besides these there were only two foreigners, Mr. Bostwick and myself, who put their names down. Yesterday three more Chinese boys joined as active members, and two more foreigners united, - Dr. Atterbury and a Russian. So the Chinese membership now stands, 22 active, and 46 associate.

图1 来会理写给理查德·莫尔士先生(Mr. Richard C. Morse)的书信

Fig.1 A letter from D. Willard Lyon to Mr. Richard C. Morse

3.2 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

以兰凤翱为代表的“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侧重于从篮球实践活动的角度来考证篮球运动传

入中国的时间。与之不同的另一种观点是“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这个说法侧重于通过对篮球这项新兴运动项目的宣传报道来追溯其传入中国的

① 资料来源于天津市体育博物馆的“让平凡伟大——中国篮球历史文化藏品展”,展览时间为2020年12月22日—2021年3月20日。

时间。

最早提出“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观点的是华裔学者吴志钢博士。1948年,吴志钢从纽约市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图书馆获得了分别于1896年1月11日、1896年1月18日和1896年4月4日出版的3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复印件。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1896年1月11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上刊登了中国第一条篮球新闻报道……(The first basketball news appeared in the Tientsin Bulletin issued by the Tientsin YMCA on January 11, 1896…)”^[9]吴志钢将这则报道认定为中国第一条篮球新闻报道,此观点逐渐演变为“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这大体是“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的最早由来。尽管如此,吴志钢在其博士论文中推断当天的篮球活动因天气原因取消了^[9]。“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因其史料较为坚实,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如中国篮球协会就采用了这一说法,中国篮球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的表述如下:“1896年1月11日、12日,《天津青年会公报》相继刊登了举办篮球比赛的消息,这是史料记载的中国第一次篮球比赛。”^[32]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也将1896年1月11日出版的《布告》视为中国第一张篮球比赛布告。中国篮球协会虽然认可了源于吴志钢的“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但并没有采信其提出的当天篮球活动取消的观点,认为当天的活动非但没有取消,而且是中国最早的篮球比赛。此外,“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也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可,包括董尔智的《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33]、谷世权编著的《中国体育史》^[34]以及

《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体育的变迁(1840—1937)》[*Missionary schools, the YM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in modern China (1840—1937)*]^[35]等诸多文献都采用了“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

尽管“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因为史料证据较为充分而具有较大影响力,但其依据的是第五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仍存在以下三点疑问:第一,此前出版的4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中是否刊登了篮球活动相关报道,尚存疑问。1896年7月10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图2)记录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创刊号于1895年12月14日出版,每周发行超过300份……主要在天津所有高校和部分商业青年中分发,以此独特的方式帮助青年们与协会及其活动保持联系。”^[36]研究团队在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前4期《布告》后发现,该《布告》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每周六发行的会刊,主要用于传播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活动信息及教育理念,且经常发布体育活动的消息,包括体育活动通知和评述、体育培训信息等,是天津青年学生了解和参加西方体育活动的主要信息渠道。经查阅后发现,分别于1895年12月28日和1896年1月4日出版的第3和第4期《布告》都有明确的篮球活动宣传报道。此外,中国篮球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提到的“1896年1月11日、12日,《天津青年会公报》相继刊登了举办篮球比赛的消息”这一表述也与其刊物每周六定期出版的记录有出入。以上史料事实充分说明,“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不足以令人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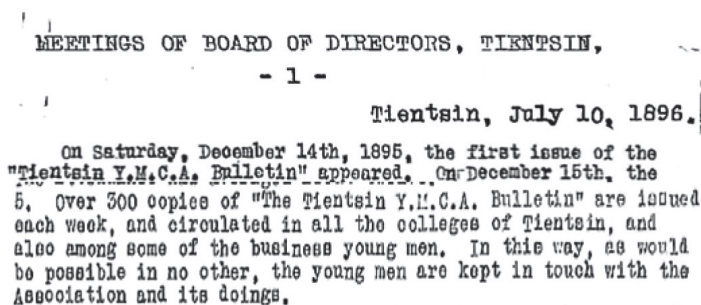


图2 1896年7月10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会会议

Fig.2 The Tientsin Y.M.C.A.'s "Meetings of board of directors, Tientsin," July 10, 1896.

第二,1896年1月11日下午的篮球活动是否因天气原因取消,尚存疑问。此日出版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图3)刊登的这则篮球活动宣传报

道明确记载活动地点为“活动室”(the room):“今天下午将开展一场篮球游戏,诚邀所有对体育运动感兴趣的青年下午4点准时到活动室参加本次篮球

游戏。篮球易学且非常有趣(A game of basket ball will be played this afternoon. All young men interested in athletics are invited to be at the room promptly at 4 o'clock in order to join the game. It is easy to learn and is very exciting)。”^[37]

鉴于活动地点已确定为室内活动室,故一般性的天气因素不足以构成活动取消的理由。因此,吴志钢关于活动可能因天气取消的推测,其前提值得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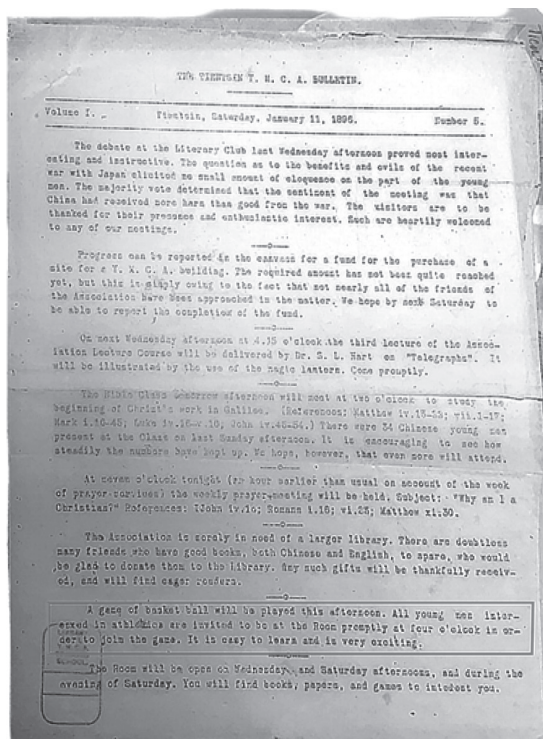


图3 1896年1月11日出版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

Fig.3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published on January 11, 1896

第三,1896年1月11日下午的篮球活动是否属于比赛,尚存疑问。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中“A game of basket ball”表述的准确理解,这关系到该日活动的性质是否能被认定为“中国第一次篮球比赛”。对此,“Game”一词的解读尤为重要,亦存在商榷空间。从词义本身来看,“Game”一词的内涵较为宽泛,既可指娱乐游戏,亦可指规则性竞赛^[38]。要准确理解此次活动中的“Game”一词,需要结合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多种因素共同指向篮球“Game”这一运动项目的开展形式更偏重于“游

戏”而非“比赛”。首先,这与篮球运动的创设初衷及其背后的指导理念密切相关。篮球运动本就是由奈史密斯博士在基督教青年会重要体育领袖古立克的指导下,为了满足冬季室内活动需求而创设的一种“易学、有趣的且能被多人在室内或其他空间进行的游戏(Game)”^[39]。而古立克的体育理念也明确强调,有组织地玩乐和团队游戏对塑造品格、帮助青少年融入社会具有重要作用^[40]。同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也与这一理念相契合。《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章程》表明该会的核心宗旨在于:“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改善身体、社交、心理和精神状况的机会。”^[41]这一系列背景共同决定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更倾向于将篮球定位为一种侧重体验与教化的“游戏”或群众性体育活动,而非正式“比赛”。其次,从活动本身和参与者的实际情况来看,“游戏”定位也更为合理。《布告》中“诚邀所有对体育运动感兴趣的青年”的措辞,体现了活动面向大众、鼓励广泛参与的“群众性”特征,这与篮球运动的包容性与娱乐性相吻合,但和规范竞技、追求胜负的“群众性比赛”有着本质区别。对刚接触篮球运动的天津学生而言,以轻松的游戏形式体验学习相较于比赛更符合实际。最后,《布告》自身的表述习惯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布告》中在提及“黑衣人追逐游戏(A game of ‘black man’)”^[42]和“活动室还增加了多米诺骨牌这个新游戏(A new game of dominoes)”^[43]等活动时,均使用“Game”指代趣味性的集体游戏,这进一步说明在当时的语境下,“Game”一词更侧重于其娱乐和社交属性。

综上所述,将1896年1月11日《布告》中提及的“A game of basket ball”简单解读为一场正式的“篮球比赛”可能尚待商榷。中国篮球协会据此认定当日举行的篮球活动是中国最早的篮球比赛,以及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将其视为中国第一张篮球比赛布告,均可能因未能辨析“Game”一词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确切含义,以及忽视了《布告》中可能存在的更早期篮球报道史实而影响了论证的说服力。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有组织地引入了“篮球”这一运动项目,1896年1月11日所举行的是

① “A game of black man”是一种起源于德国的传统儿童体育和休闲游戏,也是西欧追逐游戏中最古老的游戏之一。基督教青年会推广体育活动的重要人物古立克曾在其著作当中描述过这一游戏的玩法并表示是大众所熟知的游戏,参见: GULICK L H. JR. A Philosophy of Play[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0: 16-17。

一场以体验和学习为目的的趣味性篮球游戏,而非正式的篮球比赛。

4 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再考证

由于未能区分篮球项目文化和篮球实践活动,导致了学界、体育部门及中国篮球协会等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时间的表述存在不一致。因此,基于目前获取的原始史料进行系统考证,要厘清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时间应从两条线索着手:一是篮球运动作为新兴运动项目在华推广的时间,即中国最早的篮球宣传报道;二是中国人最早参加篮球活动的时间,即中国最早开展的篮球活动。

4.1 中国最早的篮球报道

吴志钢基于1896年1月11日出版的第五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认为其中刊登的篮球活动预告是中国最早的篮球宣传报道,但该说法因其未能涵盖更早期的《布告》内容,故尚存在不严谨之处。笔者经认真查阅此前出版的4期《布告》后发现,1895年12月28日(星期六)出版的第三期《布告》(图4)中已刊登了一则篮球活动预告:“(1896

年)1月4日星期六下午4点将举行篮球游戏,欢迎所有年轻人参加。(On Saturday afternoon, Jan, 4th, at 4 o'clock there will be a game of basket ball to which every young man is invited.)”^[44]此则预告应被视为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关于篮球运动的“宣传报道”。

该预告的历史价值重大。一方面,因其媒介属性、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官方意图以及对“Basket ball”的首次指称,初步奠定了其作为篮球运动在华早期公开文字记录的地位。《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这一正式组织的官方周刊,其发布的内容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将一项新运动的活动计划公之于众,可被视为该组织推广此项运动的信号。1895年12月28日的《布告》中首次出现“Basket ball”这一特定名称。如前所述,早期《布告》常用“Game”泛指各类娱乐游戏,但此处通过使用“A game of basket ball”的特定指称,并结合后续《布告》(如1896年1月11日第5期)将其作为一项“易学且非常有趣”的新游戏向公众推介,这表明篮球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新颖的项目被引入和宣传的。因此,对“Basket ball”首次公开提及,是探寻篮球运动传入中国“宣传报道”时间点的关键依据,也标志着篮球运动由此开始通过官方媒介向包括天津地区青年学生在内的特定社会群体进行传播。另一方面,从基督教青年会在华传播体育项目的历史背景与运作模式来看,通过官方刊物进行宣传亦符合其组织行为特点。基督教青年会在华传播体育项目时,其推广往往始于信息的初步传播和舆论的引导^[45]。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其创办伊始便有引入并宣传新式体育项目的动机,这与其宗旨是相符的。在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通过《布告》这样的媒介进行宣传预告,是吸引关注、普及概念、招募参与者等合乎逻辑的先期步骤。因此,这则预告虽然形式上是一则活动通知,但其实质是中国篮球文化传播中一个有据可查的早期起点,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于预告的篮球活动是否最终按计划举行。

综上所述,1895年12月28日出版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及其刊登的这则篮球活动预告,在中国篮球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最早有记载的篮球宣传报道,也标志着篮球这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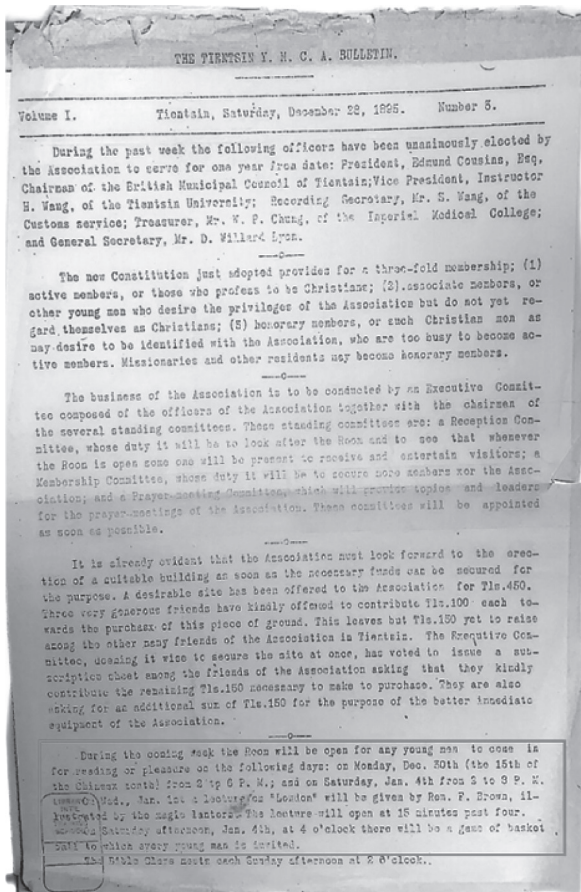


图4 1895年12月28日出版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

Fig.4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published on December 28, 1895

运动以其初期的“游戏”形态首次在中国有了公开的文字记录。其既揭开了篮球运动在华传播与普及的序幕,也为进一步考察其首次实践活动提供了关键的史料起点。

4.2 中国最早的篮球活动

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研究审慎地认为中国最早篮球活动开展于1896年1月4日。该结论以1895年12月2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的篮球活动预告为重要起点,并结合多方旁证史料得出。尽管因史料与年代受限,关于此事件的直接记录尚缺,但基于对现有史料的深度挖掘与多维度的逻辑推演,此日期最具可能性与探寻性。

4.2.1 《布告》递进式宣告构成的核心史证与逻辑推论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主要的活动宣传媒介,其递进式的报道,为篮球活动发生的可能性提供了主要证据支撑。首先,1895年12月28日出版的第三期《布告》清晰指明了

篮球活动名称、具体日期、时间及参与群体,表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这一有组织的机构,在特定时间点有意图举办该项活动。随后,在篮球活动预告当天,即1896年1月4日的《布告》(图5)中明确记载:“大家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开始显现……让每个年轻人都在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会所来参加一个小时的户外运动。你们玩过“篮球”吗?如果没有,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打篮球(Let every young man come around on Saturday afternoon at four o'clock for an hour of out-door sport. Have you ever played “basket ball”? If not, come around and learn how to play it).”^[42]这段文字的发布时间与内容尤为关键:一是发布于篮球活动当天,将性质从“未来计划”转变为“即时邀请”;二是措辞上从预告的“篮球游戏”(A game of basket ball)演变为邀请大家“学习如何打篮球”(Learn how to play it)。这个变化深刻揭示了篮球活动重在教学与推广的本质,表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不仅有计划,而且正在积极推动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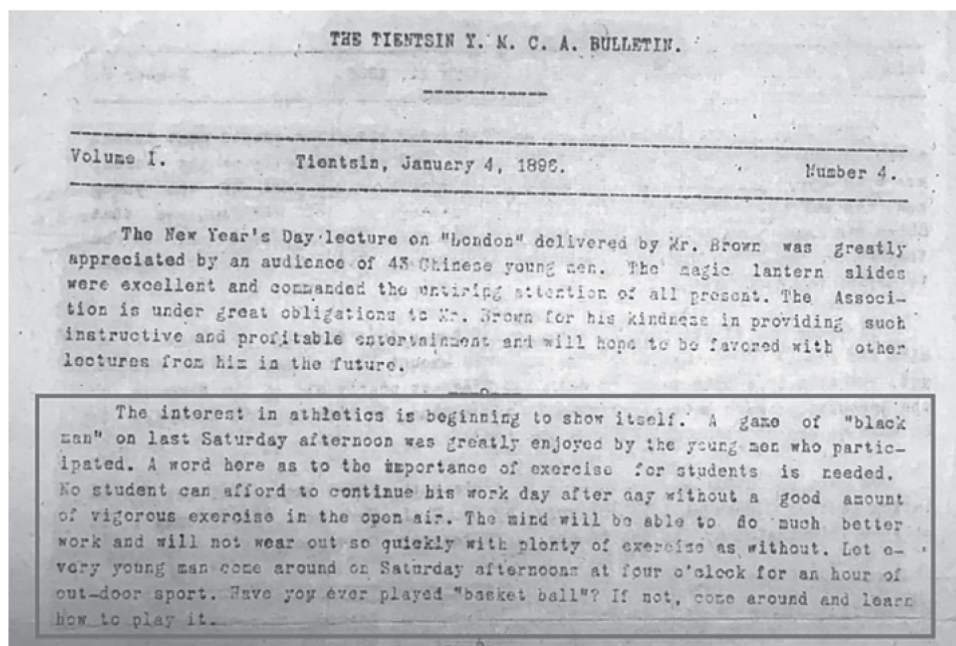


图5 1896年1月4日出版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

Fig.5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published on January 4, 1896

此外,在对现有《布告》后续各期及相关史料文献的遍查中,均未发现1896年1月4日篮球活动被取消或推迟的记载。考虑到该《布告》不仅预告未来活动,亦有回顾当周重要事件的习惯,例如1896年1月11日第五期《布告》便总结了上周1月5日的查经班与1月8日的辩论会的开展情况。那么对于一项经过两次宣传的新兴活动,若其最终未能举行,

作为一个负责的组织理应会在其主要宣传平台有所提及。因此,缺乏取消的报道,反向佐证了活动大概率如期举行。

诚然,1896年1月11日的《布告》也未对该次篮球活动进行正面的回顾性报道。然而,对于一次可能规模不大、侧重初步体验与学习的篮球“游戏”,其未被详细总结也在情理之中。考虑到《布告》的

版面和侧重点有限,它可能会优先报道那些作为青年会服务基石的常规项目(如查经班与辩论会),或是推广那些已被验证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示范性活动,如1896年1月4日(第4期)报道的“黑人追逐游戏”。总而言之,一项首次尝试的活动未被总结并不等同于活动未发生。相较之下,对于已宣传活动的取消,通常更具信息传递的必要性。因此,综合1895年12月28日的预告、1896年1月4日当天的再次宣传与学习邀请,以及后续《布告》中未见取消的信息,这些因素共同指向当日篮球活动较大可能按计划举行,构成了认定其为中国最早篮球活动时间的证据链起点。

4.2.2 作为旁证的组织惯例与情境条件

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动因、活动惯例及客观条件的分析,也为1896年1月4日篮球活动的如期举行提供了合理的情境支持。

第一,组织动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推广策略。基督教青年会作为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体育最重要的推动力量^[46]。在其“德、智、体、群”四育理念的指导下,体育活动与教育相结合被视为塑造青年、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47-48]。对于尚在发展初期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而言,选择推广篮球运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分支机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迫切需要通过举办有吸引力的公开活动来展示其组织活力,以及吸纳会员的能力,并迅速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广策略是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全球性组织内在运作逻辑的必然体现。如前所述,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具备明确全球战略的国际组织,推广篮球这一项目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因此,首次公开宣传的篮球活动若能顺利进行,将为后续在天津地区推广体育理念、奠定社会服务工作的美好开端,具有重要的示范与推广价值。

第二,活动惯例:周六下午常规体育活动的确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遵循着固定的组织惯例,其形成与当时社会时间观念的变迁密不可分。19世纪末期,随着“星期”与“周末”等西方时间观念的传入,在工作周之外进行休息与休闲娱乐的习惯逐渐在中国社会普及^[49]。进一步查阅《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可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正是顺应此趋势,在该时期每周六下午都会开展体育或文娱

活动。例如,《布告》中提到:“(1895年)12月21日(星期六)下午2点至8点,活动室开放。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获得论文、书籍和玩游戏。”^[50]“活动室将在以下日期开放,供青年会成员阅读和玩游戏:(1895年)12月28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8时。”^[51]特别是从1896年1月4日的《布告》可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倡导青年每周六下午到会所参加户外活动,还积极鼓励大家在这一时段参与并学习篮球这项新兴运动。因此,将一项新的体育活动安排在“星期六下午4点”这样一个固定的常规活动时段,不仅是顺应社会时间习惯的选择,也符合这一西方传统组织的运作逻辑,为活动的如期举行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和便利,提高了活动实施的可靠性。

第三,客观条件:活动地点的保障。活动举办的客观条件,特别是场地因素,同样支持1896年1月4日篮球活动按计划举行的推断。根据史料记载可以推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内的活动室是青年会早期的核心活动区域。例如,来会理在工作报告(图6)中曾提到:“在北洋医学堂任教的长老会安德培博士(Dr. Atterbury)向协会捐赠了一栋单层单间的小楼(图7),……这个房间集阅览室、游戏室、聚会室及圣经课室于一体……,最多只能容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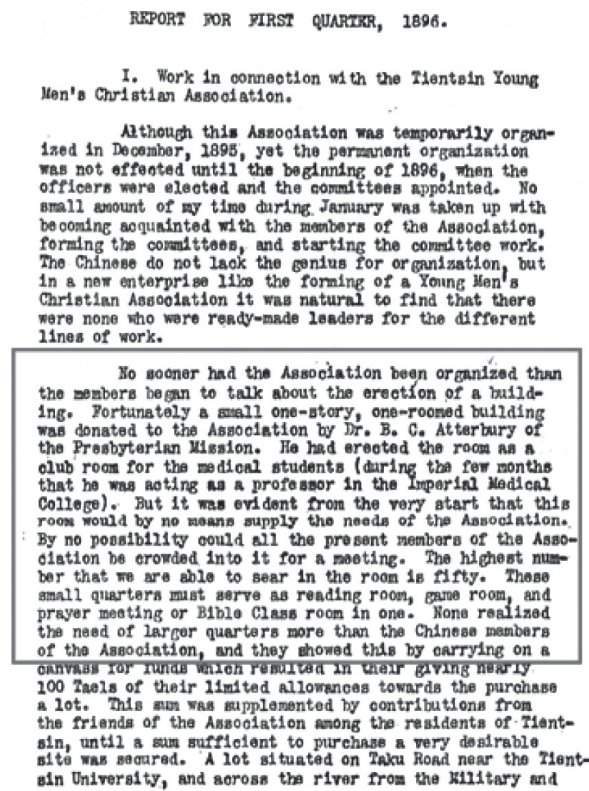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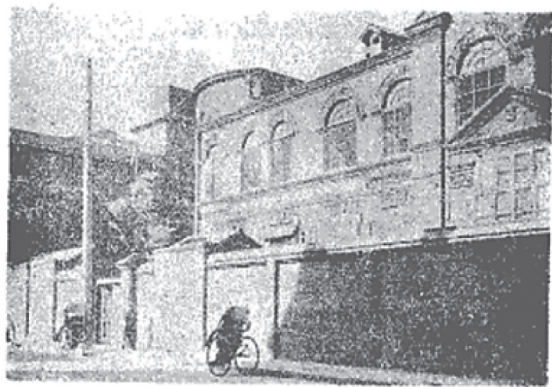


图6 1896年第一季度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报告》
Fig.6 The "Report for first Quarter 1896" from the Tientsin Y.M.C.A.



所會之時立創會本前年十四
The First Y. M. C. A. Building of 40 years ago

图7 189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Fig.7 The clubhouse of the Tientsin Y.M.C.A. in 1895.

注: 资料来源于1935年出版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册》第2页的插图部分

50人。”^[52]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来会理因地制宜地将这栋小楼作为会所,并将小楼内的房间(即活动室)作为积极开展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尽管1895年12月28日的《布告》当中预告篮球游戏时未直接点明具体地点,但结合该活动室作为青年会主要游戏场所的功能定位,以及1896年1月11日《布告》明确记载篮球游戏在“活动室”(The room)举行的情况,可以合理推断1896年1月4日的篮球活动同样计划并发生于活动室内。再者,1896年1月18日的《布告》中,来会理意识到活动都集中在活动室举行,空间不足的问题已经凸显^[53],进一步佐证了室内场地使用及在此之前活动开展的频繁。此外,随着会员对篮球热情的高涨及篮球活动的常态化开展,后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将篮球活动转移至了室外举行^[54]。这一变化间接证明,早期篮球活动确实始于室内活动室。此地点的确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因天气等因素导致活动临时取消的可能性,更因其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自身掌控的室内活动空间,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从而为进一步讨论其具体情况奠定了基础。

4.2.3 综合推断首次活动的关键要素

基于前文1896年1月4日篮球活动大概率发生的论证,虽然因时代和史料受限缺乏详尽的事后报道,但通过对现有史料的综合分析,仍可尝试对此次活动的关键要素(组织者、参与者、活动形式)进行合

理推断,以此与前文的论证相互支持,共同指向活动举行的合理性。

第一,组织者:总干事来会理的推动作用。在组织者方面,虽然目前尚无史料能够明确证实来会理曾亲自示范篮球游戏或亲自教授天津青年学生篮球的基本技能,但多方线索表明他应是关键的推动者。首先,来会理是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派遣至中国的第一位西籍干事,肩负着开创与领导青年会事业的使命^[55]。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首任总干事,他全面负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立、日常运营以及各类活动项目的规划与推行。其中,体育活动向来是基督教青年会承载其青年人格全面发展理念的关键载体。而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们,正是这些体育项目推广与组织的具体执行者^[56]。篮球活动的预告既然刊登在由来会理领导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官方刊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之上,那么这项新活动的引入与组织自然属于其作为总干事的职责范畴。再者,来会理在天津的工作亦体现出对体育的高度重视。19世纪末,基督教青年会成为推动中国现代体育发展的中坚力量,来会理正是通过资助赛事、宣传报道及演讲等方式积极推广体育运动^[57]。为了迎合当时中国人对军事体能的兴趣,来会理还亲自到天津高校当中教授军事训练课程^[58]。这表明其在华工作本身便包含通过体育等现代活动吸引并服务青年的使命。此外,鉴于篮球运动自发明后迅速在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国大学中流行,并考虑到来会理的教育背景也使他极有可能已接触并了解这项新兴运动,这为他在天津的推广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基础。因此,综合其职位、理念与个人背景,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来会理,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篮球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与推动者。

第二,参与者:以天津青年学生为主体。关于此次篮球活动的主要参与群体,多方面证据指向天津高校的青年学生构成了活动的主体。首先,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与工作重点与学生群体紧密相关。总干事来会理选择天津作为其在华事业的起点时,明确指出天津因其“是中国唯一拥有完善的西学教育机构体系的城市”而备受青睐^[59]。他在回忆录中亦有记述,天津首个成立的青年会(即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会,由多所大

学联合组织,且会员主要来自官立学校而非教会大学的学生^[54]。这揭示了其工作重心自始便锁定在学生群体。其次,《布告》刊登的篮球相关宣传报道中“欢迎所有年轻人参加”的表述,进一步印证了参加中国最早的篮球活动的人员主要是天津的青年学生。此外,20世纪初天津地区的高校亦大力开展篮球活动^[60],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学生群体对此类新兴体育项目的持续热情和参与基础,间接支持了早期篮球活动以学生为主体的推断。因此,可以合理认为中国最早的篮球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应是天津地区的青年学生。

第三,活动形式:趣味性的篮球“游戏”。考虑到这是篮球运动首次被有组织地介绍给天津青年,如前所述,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引入新兴运动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结合对于“Game”一词的分析,早期篮球活动应侧重于体验、学习与普及。此外,篮球比赛对技能水平和场地条件有较高要求,对于刚引进这一新项目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初次接触篮球运动的天津青年学生来说,首次活动便开展正式篮球比赛显然并不具备现实条件,相比之下,趣味性的篮球游戏更有利于培养他们对这项新运动项目的兴趣,从而为日后的推广和普及奠定基础。基于此,中国最早开展的篮球活动应当为趣味性的篮球游戏,而非比赛。

尽管多方面证据支持1896年1月4日在天津青年会会所内举行了以学习和体验为目的的篮球游戏,但因时代久远及史料记载受限,关于此次活动的具体参与人数、确切的游戏形式或互动细节,在目前已发现的史料中尚无记载。

5 结语

“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基于此原则,研究立足于新近发掘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等核心原始档案,通过对多重证据的考证与严谨的逻辑推演,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进行了系统考察。研究辨析并指出了学界既有主流观点在史料依据上存在的商榷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审慎地提出:中国最早的篮球宣传报道,可追溯至1895年12月28日刊载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的篮球活动预告。而中国最早的篮球实践活动,则极有可能是在1896年

1月4日,由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来会理组织、以天津青年学生为主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内举行的一场趣味性篮球游戏。以中国最早的篮球报道和篮球活动为标志,篮球运动率先在天津开展起来并辐射全国,不仅将天津确立为中国篮球运动的发源地,也为中国篮球史增添了约130年的可考历史。

鉴于篮球运动在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准确厘清这段历史,首先能深化对篮球运动在华传播初期形态与文化根源的认知,进而对探究早期中外体育交流实践、丰富公众的篮球文化视野亦有裨益。更深远地,这对于传承体育精神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基于此,研究建议中国篮球协会等相关权威机构,应对其官方发布的关于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相关表述进行重新评估,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篮球文化的健康发展与深远传播。

参考文献:

- [1] 余日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M]. 上海: 青年协会书局, 1927.
- [2] 宋如海. 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M].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 上海: 上海青年协会书局, 1935.
- [3] HUGHES T. Tom brown at oxford: A sequel to school days at rugby[M]. Boston: Ticknor and Fields, 1861.
- [4] GLADDEN W. Applied Christianity: Moral aspects of social question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 1886.
- [5] NAISMITH J. Basket ball[J]. The Triangle, 1892, 1(10): 144-147.
- [6] MOTT J R.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M].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1900.
- [7] NAISMITH J. Basket ball[J].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 1914, 19(5): 339-351.
- [8] NAISMITH J. Basketball: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M].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41.
- [9] WU C-K. The influence of the YMCA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56.
- [10] JOHNSON E L. The history of YMCA physical education[M]. Chicago: Association Press, 1979.
- [11] XING J.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 1919-1937[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3.
- [12] POLUMBAUM J. From evangelism to entertainment: The YMCA, the NBA,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basketball[J].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02,

- 14(1): 178-230.
- [13] MORRIS A D, ALTER J S.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14] HÜBNER S. Muscular Christianity and the western civilizing mission: Elwood s. brown, the YMCA, and the idea of the 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 [J]. *Diplomatic History*, 2015, 39(3): 532-557.
- [15] 董守义. 篮球小史 [N]. *体育周报*, 1932-02-13(2).
- [16] 汪剑鸣. 篮球指导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17] 蒋桐森. 篮球研究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 [18] 体育学院、系教材编审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史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 [19] 姜登荣. 旧中国的篮球运动 [J]. *成都体院学报*, 1985(2): 6-11.
- [20] 马耀汉, 高卫, 姜健新, 等. 中国篮球运动大事记 [M]. 西安: 西安体育学院科研所, 1987.
- [21] 李辅材, 文福祥, 董尔智, 等. 中国篮球运动史 [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1.
- [22] 崔景波. 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 [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5.
- [23] 茹亚伟, 曾允菁, 刘波. 国际视野与中国实践: 体育跨国史研究探骊 [J]. *体育学研究*, 2022, 36(4): 108-118.
- [24] 兰凤翱. 天津近代体育要事记述 [M]. 天津: 天津市体委文史办公室, 1990.
- [25] 兰凤翱. 篮球运动引入天津考略 [J]. *体育文史*, 1991(5): 64-65, 12.
- [26] 罗世龙.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 [27] 金安. 民国时期篮球运动发展研究 [D]. 苏州: 苏州大学, 2020.
- [28] 国家体育总局. 篮球运动登陆天津120周年主题大会举行 [EB/OL]. (2015-12-09) [2025-03-25]. <https://www.sport.gov.cn/n20001280/n20745751/n20767277/c21412124/content.html>.
- [29] Anonymous.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Tientsin [N].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1895-12-07(92).
- [30] LYON D W. Letter to Mr. Richard C. Morse, 1895-12-16 [A].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File number: (Box 1, Folder 4): 173.
- [31]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 Willard Lyon Papers [EB/OL]. [2025-04-05]. <https://archives.lib.umn.edu/repositories/7/resources/8042>.
- [32] 中国篮球协会. 中国篮球活化石: 天津“百岁”球馆 [EB/OL]. (2022-05-24) [2025-03-22]. <https://mp.weixin.qq.com/s/jYQc7UJzRfYBQLuA1Ko6Pw>.
- [33] 董尔智. 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 [J]. *体育文史*, 1987(2): 66-67.
- [34] 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 [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7.
- [35] ZHANG H J. Missionary schools, the YM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in modern China (1840-1937) [D]. Perth: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2015.
- [36] LYON D W. Meetings of Board of Directors, Tientsin, 1896-07-10 [A].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File number: (Box 84, Folder 1): 2.
- [37]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N]. January 11, 1896.
- [38] KRETCHMAR R S.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s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 [M].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2005: 159-163.
- [39] Springfield College. Where basketball was invented: The history of basketball [EB/OL]. [2025-05-08]. <https://springfield.edu/about/birthplace-of-basketball>.
- [40] GULICK L H. JR. A philosophy of play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0.
- [41] LYON D W. The Y.M.C.A of Tientsin, 1895 [A].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File number: (Box 22, Folder 3): 81.
- [42]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N]. January 4, 1896.
- [43]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N]. February 1, 1896.
- [44]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N]. December 28, 1895.
- [45] RISEDORPH K A. Reformers, Athletes and Students: The YMCA in China, 1895-1935 [D]. Louis: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4: 205-213.
- [46] 李传奇. 激荡与变革: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过程考 [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5): 40-48.
- [47] 赵怀英. 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与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 [J]. *美国研究*, 2010, 24(2): 95-113.
- [48] YMCA of Hong Kong. The YMCA and the Olympic Movement in China from 1895-1920 [A].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File number: (Box 5, Folder 16): 2.
- [49] 湛晓白. 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 [50]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N]. December 14, 1895.
- [51]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N]. December 21, 1895.
- [52] LYON D W. Report for first quarter, 1896 [A].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File number: (Box 1, Folder 4): 118.
- [53]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N]. January 18, 1896.
- [54] 来会理. 来会理先生早年创始本会之史实 [M].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册, 天津: 天津直隶印字馆, 1935.
- [55] WISHARD L D. Letter to Dr. B. C. Atterbury, 1895-04-13 [A].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File number: (Box 22, Folder 3): 57.

- [56] BOUCHER A. The introduction of sports in China[J]. *China Perspectives*, 2008, (1): 48-52.
- [57] 徐国琦. 奥林匹克之梦: 中国与体育: 1895-2008[M]. 崔肇钰,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 [58] GARRETT S S.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59] LYON D W. Letter to Mr. Richard C. Morse, 1895-11-08[A].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File number:(Box 1,Folder 4): 170.

- [60] 学生新闻. 天津之篮球[J]. 学生, 1917(4): 121-122.

作者贡献声明:

马紫云: 收集资料, 撰写与修改论文; 涂传飞: 收集资料, 提出论文选题与研究思路, 指导论文撰写与修改; 张慧杰: 提供研究资料与修改意见; 王道杰: 提供研究资料与修改意见。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Earliest Introduction of Basketball to China

MA Ziyun¹, TU Chuanfei¹, ZHANG Huijie², WANG Daojie³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long been controversy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garding the earliest time when basketball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issue primarily adopting the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interviews, and logical analysis. It analyzes two prevailing theories—the “December 8, 1895” and “January 11, 1896”, revealing that both lack sufficient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rigorous argumentation, which remains difficult to be entirely convincing. Through the excav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primary historical sourc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first, tracing two clues related to the earliest promotional report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basketball helps clarify the specific time of the sport's introduction to China; Second, the earliest promotional report about basketball in China should be the basketball activity announcement published in the *Tientsin Y. M. C. A. Bulletin* on December 28, 1895; Third, the earliest basketball practice in China was most likely a fun basketball game held at 4 p.m. on January 4, 1896 in the activity room of the Tianjin Y.M.C.A., and the main organizers and participants were D. Willard Lyon,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Tianjin Y.M.C.A., and Tianjin young students. Both of these landmark events occurred in Tianjin, solidifying its historical narrative as the “cradle” of Chinese basketball. This research supplements crucial early facts to China's basketball history and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and other relevant organizations re-evaluate the rigor of their statements regarding the earliest introduction of basketball to China.

Key words: basketball reports; basketball activities; basketball history; time of introduction to China; *Tientsin Y.M.C.A. Bulletin*; D. Willard Lyon